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 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李红梅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理论 中国地缘战略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分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6-0095-18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6006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历史上, 地缘政治理论与大国的地缘战略密切相关,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国地缘战略的制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传统以地理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地缘政治理论尽管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难题,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地缘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和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国家利益的外溢呈加速态势, 而当今国际权力格局则处在转型之中, 因此中国应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战略。地缘战略的制定深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 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带有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和争霸逻辑, 不符合中国寻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 因此地缘政治理论在中国曾一度遭到诟病和排斥。但是, 人为“过滤”并未导致地缘因素重要性的下降, 尤其是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 日渐式微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再次受到学界关注, 这也证明了地理因素的客观重要性。而自 2017 年 6 月开始并持续了 70 多天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这些客观事实表明, 地缘政治思维在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从未淡化, 实际上一直在发挥潜在作用, 甚至主导着部分国家的行为逻辑。只是在冷战后,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的进步、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全球治理的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竞争的外在环境, 并使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在冷战后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 对冷战结束之前以及之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特点进行分析, 以深化对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整体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提出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特点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于 1899 年提出, 并将地缘政治视为“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①。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地缘政治是

^①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一种关于地理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关系影响的分析”^①。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包括海权论、国家有机体论、心脏地带论以及边缘地带论，也可以总体归纳为关于海权与陆权的研究。

1890年，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通过考察英国在17—19世纪期间海上霸权建立的历程，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其主要结论是“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有着巨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②，对国家在战争与平时时期的福祉至关重要，^③并认为海权拥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④而获取海权的关键在于对海上重要咽喉要道以及航线实施控制，以获取制海权。该理论被西方大国长期奉为圭臬，美国的海权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地缘政治理论的观点。这也使该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热捧，例如，印度军方就长期把马汉的海权论视为印度海权发展的“圣经”，除了马汉提出的构成海权的六要素（即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特征以及政府体制）外，还包括印度的海权鼻祖、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贾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所提出的更为关键的第七要素——科学成就与工业实力，印度认为其自独立以来除了政府体制、科学成就与工业实力这两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外，其他五个方面已具备海权发展要求。^⑤1958年3月，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站在“迈索尔”（INS Mysore）号巡洋舰的甲板上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海上软弱的代价……历史证明无论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印度的海上贸易将仰人鼻息；其次，印度的独立不保。”^⑥此外，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⑦

^① Torbjorn L. Knutsen, “Halford J. Mackinder, Geopolitics, and the Heartland Thesi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14, Vol. 36, No. 5, p. 835.

^② 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③ James Holmes, “Mahan, a ‘Place in the Sun,’ and Germany’s Quest for Sea Power,” *Comparative Strategy*, 2004, Vol. 23, No. 1, p. 28.

^④ 李义虎：《海权论与海陆关系》，《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第17页。

^⑤ “Blueprint to Bluewater,” Indian Navy,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 46. <https://www.indiannavy.nic.in/node/1421>.

^⑥ *Ibid.*, p. 2.

^⑦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另外，由于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德国政治地理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97年在其《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了地缘政治研究，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论，强调“生存空间”与“种族优越”，认为国家就像生物有机体那样具有生长、扩张与死亡周期，而国家要实现生存与发展必须对外实行领土扩张，拓宽疆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也为德国后来的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真正对希特勒的纳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关键人物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他在吸收拉采尔、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其学生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ss）获得了直接向希特勒兜售其生存空间论的机会，并被希特勒写进了《我的奋斗》一书中。^①而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也正因为其刻意扭曲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实质，主张极端的地理决定论，成为德国在二战中进行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而遭到世人诟病，并导致二战后整个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衰落；正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也受到影响，同时还导致以国家有机体论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学界备受争议。而在英国，与马汉的海权论相对，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上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首次提出枢纽地带论，表达了对英国全球地位的深刻担忧。麦金德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枢纽地带的战略重要性，认为现代铁路系统的机动性为枢纽国（俄国）带来了优势，有利于其利用庞大的陆地资源向欧亚大陆边缘扩张并建设舰队。^②英国尤其恐惧俄国与德国结盟对枢纽地区进行控制进而统一欧亚大陆，^③从而使海权与陆权的权力对比向有利于陆权的方向转变，陆权对海权构成威胁，^④进而对建立在海权优势基础上的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相反，1942年尼古拉斯·斯皮克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2005, Vol. 24, Issue 1, p. 24.

^①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4-25页。

^②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4, Vol. 170, No. 4, p. 313.

^③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16页。

^④ Geoffrey 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9, Vol. 22, Issue 2-3, p. 26.

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提出了边缘地带论,强调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西欧与东亚)比大陆中部的核心地带更重要,是控制世界的关键。他当时尤其担心欧亚大陆、印度洋地区最终被德日“轴心国”所控制,从而导致美国的海上航线面临被切断的威胁。^①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斯皮克曼的理论的合理性。总体来看,虽然上述几大理论在观点上有所区别,结论迥异,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本文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强调权力视角

从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最初发展动机来看,基本上多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即理论的目的是通过国家权力的维持或扩张来服务于国家利益。另外,由于这些理论放眼全球、视野宏大,因此只有大国才能成为“玩家”。例如,马汉的海权论主要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为美国对外权力的扩张提供指导。马汉曾指出,控制具有重要商业与军事战略价值的夏威夷群岛、中美地峡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对保障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海岸安全至关重要。当时正逢德国在对外商业扩张过程中分别与英国、西班牙、美国发生冲突,而德国好战的国民性格也让马汉认为德国有对外侵略的倾向。^②同时,对海上霸主英国和欧洲陆上强国法国可能试图攻击美国海岸的怀疑也是马汉强调建立美国海权的因素之一。基于此,马汉主张美国的海军战略应从积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但前提是先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并拥有海外殖民地和前沿军事基地。^③从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获取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增加权力,因此马汉强调要打造美国的大海军力量,以便于权力的争夺。后来的斯皮克曼为美国设计的边缘地带论更多是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的需要,借此既防止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单一霸权挑战国,同时还可以通过控制边缘地带达到遏制心脏地带潜在霸权国崛起的目的。而心脏地带论则充分体现了麦金德希望保持海陆权均势的立场,特别是强调保持东欧国家的独立对于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单一霸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俄国已

^① Spykman N. J,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 194.

^② 马汉:《海权论》,一兵译,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56页。

^③ James Holmes, "Mahan, a 'Place in the Sun,' and Germany's Quest for Sea Power," p. 31.

取代蒙古帝国，并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构成战略压力”^①，具有向东、南、西三面出击的地缘优势。为了防止英国霸权衰落，麦金德主张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支持东欧国家独立，防止它们成为德国或俄国的势力范围。但对权力的强调最为极端的则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其直接成为服务于希特勒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另外，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深受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机械地强调自然地理条件对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影响。

（二）强调空间结构主义视角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封闭系统，尤其是麦金德比较强调这一点，他认为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导是可行的政治目标。^② 这主要源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把地理空间与权力变迁的关系绝对化了，即过分强调特定静态的地理空间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因此，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批判“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③。无论是马汉对夏威夷群岛、中美地峡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重要性的强调，还是麦金德对枢纽区域、内新月形地区、外新月形地区，以及后来经过两次修改的心脏地带区与其他区域的划分，都体现了一种空间结构主义的视角。即把作为整体的全球系统按地理划分为不同的空间结构，并把它们按权势重要性排列。例如，心脏地带与真空地幔地带的差别；又如，斯皮克曼划分的西欧与东亚边缘地带对权力的决定性作用等，都是一种空间结构的划分；再如，拉采尔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更将空间视为唯一信条，强调空间至上，将空间结构提升到极致。

（三）强调冲突视角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具有强烈的冲突与零和观念，认为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强调对重要地缘空间位置的排他性占领，认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是冲突的。由于地缘政治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范畴，因此其与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间利益冲突、零和关系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地缘政治理论本

^①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1904)," p. 313.

^② Geoffrey 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p. 35.

^③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李保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6 页。

身发端于国家维持或加强权力的需要,因此在本质上是强调零和关系。欧洲从16世纪到19世纪对均势的运用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权力冲突的性质,由于单一强国掌握压倒性权力后必然会选择称霸,而其他国家则自发形成联盟以达到制衡霸权的目的,从而实现权力的均衡。尽管马汉海权论的逻辑起点源于美国海上贸易、海外市场占有的需要,但从传统海上强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西班牙还是英国,发展海权都是防止在海外殖民地及海上贸易中与他国发生冲突的有效手段,马汉对建立海权的逻辑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①在当时,欧洲国家由于工业的发展急需寻求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相互在亚非拉地区展开斗争,陷入冲突,而取胜的关键则在于军事实力。19世纪末,德国成为西欧地区最强的国家,其陆军无人匹敌,同时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对海上霸主英国构成了直接威胁,双方摩擦不断。

(四) 强调绝对主义视角

从绝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将地理因素绝对化。尤其在麦金德的陆权论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从1904年他提出关于枢纽区域的划分后,在1919年和1943年两次关于心脏地带的划分都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进行的。尽管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完整系统,但关于世界地图的三次划分越来越详细,各区域板块之间的分化重组更为复杂,而且具有多极均势特征。马汉的海权论与此类似,他强调“在无数的工业竞争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②。斯皮克曼在《地理与外交政策》一文中,也把地理作为塑造一国外交政策最关键的因素,尤其强调区域位置决定一个国家邻国的多少与强弱。^③尽管在麦金德的理论中能够发现他对科学技术、交通、人力资源、组织结构等发展过程的重视,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他的理论更多是机械的和静止的。而这种视角对后来的一些理论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理论、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均

^① 马汉:《海权论》,第110页。

^② 同上,第108页。

^③ Spykman N. J.,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8, Vol. 32, No. 2, p. 213.

势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的中心—外围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二、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级体系宣告终结。在冷战时期因美苏意识形态划界而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也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加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使以权力为目的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面临时代挑战，其强调冲突的根本特点已与全球化背景下对合作的强调格格不入，因此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地缘理论应运而生，包括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天权论、网权论等，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权力内涵的多元化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核也在不断演化，并呈现出权力内涵多元化的特征，即从传统的强调争夺政治权力扩展到了对经济、文化、网络、太空等领域权力的角逐。例如，就地缘经济学而言，1990年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一文，首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概念，^②他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冲突逻辑与贸易法则的混合物。^③与基于政治、军事权力目的的地缘政治学相比，地缘经济学可以理解为是基于经济权力目的，并追求在经济领域的相对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地缘经济学显示出了比地缘政治学更强的现实性和解释力，可以说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分支中最有发展前景的一支。爱尔兰学者约翰·莫里西（Johns Morrissey）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地区的全面参与事实上是实施了一种地缘经济威慑战略，即将商业市场作为美国大战

^①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8-33页。

^② 洪菊花、骆华松：《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争及中国地缘战略方向》，《经济地理》2015年第12期，第26页。

^③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 No. 20, p. 19.

略的关键要素。^①而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对文化权力的强调。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并把文明视为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把世界划分为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②亨廷顿提出未来塑造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文明,而不是其他因素,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前沿。在宏观上,文明冲突主要在西方与非西方展开;在微观上,文明冲突主要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展开,^③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越来越剧烈。亨廷顿独特而悲观的论断的潜在意图是对文化权力的强调,要在文明领域的冲突中获得胜利,必须要获取权力,即文明的相对优越性。而网权论和天权论作为新的理论发展分支,它们强调对虚拟网络空间的主导权和在太空领域的主导权的争夺。在21世纪互联网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以及对网络安全的维护,而获得主导权就是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因此,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并非完全排除了对权力的强调,而是权力的内涵更多元化了。

(二) 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

传统地缘政治对地理位置和空间的强调至关重要,而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逐渐超越了这种地理空间的范畴,认为以领土为单位的地理空间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削弱,虽然并未完全消失。其中有学者就认为地缘经济的发展正在促使去领土化的实现,弱化了地理空间的重要性。而文明冲突论干脆拒绝地理空间层面的重要性,相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并把文化与文明因素置于未来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首要地位,网权论则直接把虚拟的网络空间作为未来国家间争夺的战略高地。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无

^① Johns Morrisey, "Goeconomics in the Long War," *Antipode*, 2017, Vol. 49, No. S1, p. 94.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纬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7页。

^③ 同上,第230页。

一不涉及网络空间，而目前各主要大国都在强调网络主权，并加强各自的网络空间安全建设。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具有技术优势，因此也最早开展了网络主权的研究，并应用于军事领域。美国时任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Jay Johnson）早在 1997 年就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随后，1998 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时任院长阿瑟·塞布罗斯基（Arthur Cebrowski）发表了《网络中心战：起源与未来》一文，该文成为网络中心战理论的奠基之作。^① 在此基础上，美国在网络空间占据了一定技术优势，然而目前各国都意识到了网络空间维护与治理的重要性，因此未来该领域将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也将成为国家与企业、组织、个体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个体与个体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此外，作为空权论的发展和延伸，天权论也越来越受到大国的重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苏开启了外太空争夺战，1983 年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欲通过高科技的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同时主导外太空的游戏规则。由于外太空空间的争夺对一国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要求较高，因此在 20 世纪还只是少数大国可以涉足的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科技水平的发展，更多大国参与竞争，它们之间对外太空空间的争夺和利用日趋激烈，使天权论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分支。由此来看，冷战后对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强调就成为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特征。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

总体来看，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所有分支，均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它主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尖锐批判。1992 年，美国学者杰拉德·奥特瓦塞尔（Gearóid Ó Tuathail）与约翰·安格纽（John A. Agnew）合作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开启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进程。^② 该理论的产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批判

^① 张怀民、郝传宇：《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看其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2 期，第 55-56 页。

^② 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 年第 4 期，第 42 页。

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综合影响,其中批判理论拒绝在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构建中的实证主义取向,注重人类日常社会互动中的理解与认知,^① 这为后来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比较的角度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研究地理空间与国家权力变迁的关系,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则是由一组政治话语、陈述与一系列政治实践组成。^② 从本体论来讲,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物质主义的,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更注重认知和理念,因此是理念主义的。从方法论来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注重结构,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注重过程,即关注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等背景影响下对地理空间、国家边界等的看法及其对国家间政治互动的动态影响。而且,批判地缘政治理论还消除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强调将世界视为一个统一且平等的整体,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西方话语垄断的利益诉求。总之,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是立足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上对其进行的解构和再塑,它并非彻底取代,而是在批判和反思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而其他地缘政治理论分支也具有这一新的特点,在此不再赘述。

三、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战略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特点,不仅加深了对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脉络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对构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思考,并最终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战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利益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8月15日发布的一项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预期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仍具有强劲发展势头,IMF将中国在2017—2022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预期从2016年的6.0%上调到了6.4%。^③

^① Simon Dalby, "Critical Geopolitics: Discourse, Difference and Diss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1, Vol. 9, Issue 3, p. 265.

^② 胡志丁、陆大道:《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地理学报》2015年第6期,第852页。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in Six Charts*, August 15, 2017,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地缘政治研究的需要。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崛起模式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也不会选择“国强必霸”的道路，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学界需要就地缘政治发展演变的特征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构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思考，并从总体上探讨中国地缘战略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思考

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至今，虽然其有过不光彩的历史，然而该理论的深远影响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普遍实践却不容忽视。实际上，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学界还是政策界，对它的讨论都从未停息，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而且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部分大国的对外战略依然深受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地缘政治理论本身也在随着客观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特点有所区别，在此基础上，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家利益，本文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注重地缘结构与过程的有效结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过于关注结构而忽略了过程，结构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冷战后出现的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尤其注重过程的动态变化，客观来说，对过程的关注有利于理论本身的灵活性和可变性，避免出现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但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理论发展态势具有过分集中于过程研究而忽视了空间结构的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结构取向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过程取向相结合，在空间上注重结构，在时间上又注重过程的动态变化。因为在地缘政治中，地缘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构属性，是静止的，而国家则是动态变化的。但无论是结构还是过程，它们本身并不是理论建构的目的，理论的最终目的始终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与上文提到的几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一样。但是在地缘政治中注重民族国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国际组织、公司集团、个人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全球化深入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7/08/09/NA081517-China-Economic-Outlook-in-Six-Charts>.

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重新理解权力概念。事实上，在讨论地缘政治理论时，对核心概念“权力”的刻意回避会导致理论本身失真。国内学界对权力概念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回避，主要由于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过分讨论权力容易遭到来自霸权国的敌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对中国构成战略围堵，破坏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也违背了中国遵循和平发展道路的本意。但需要注意的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依然具有权力诉求的本质特征，然而其概念范畴已明显扩大，并更多强调在地缘中的经济、文化、话语主导、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权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这种“权力”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权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强调通过构建强大的陆权或者海权来维护或发展国家利益，突出的特征是对军事手段的强调。但笔者认为，对权力概念的重新理解更强调权力的范畴和侧重点，随着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权力范畴不应仅停留在政治、军事领域，而应将经济、文化、规则制定等领域的权力作为重点，这既符合全球化背景下对自由市场竞争的要求，也符合中国提倡的“文化自信”的要求，还符合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要提高规则制定能力的要求。^①同时，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海陆军事权力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因为它们始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

第三，基于中国自身实力。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理论具有三大功能：描述、解释和预测。任何理论最终都是服务于实践，理论既要引导实践，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作为一项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理论，地缘政治理论也不例外，如果理论提出的要求超越了国家的实力水平，或者理论设计的目标超越了国家可利用资源的能力，轻则可能导致理论失去实际意义，重则可能误导国家的政策走向。在这方面，英国就曾有过深刻的教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就是服务于维持英国霸权地位的需要，尽管该理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英国当时尚未具备实践该理论的足够实力。而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本身也存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不可行性的悖论，张文木先生称这种现象为“麦

^①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1652.htm。

金德悖论”。^① 1919年，英国第三次入侵阿富汗时以失败告终。而且，由于麦金德的理论后来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该理论也是德国后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葬送国家前程的因素之一，从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也是如此。因此，在发展对外战略理论时要根据国家的综合实力量力而行，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维护国家利益，防止理论误导实践而造成重大政策失误。

此外，中国在发展地缘政治理论时应特别注意马汉所提到的：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海权和陆权。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体量有限，军费开支有限，如法国、德国就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一国的发展而言，并非只能在海权或陆权中选其一，而是无论国家选择发展海权或者陆权，抑或发展海陆复合型权力，都必须基于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来进行考量，即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要与实力相匹配。

（二）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关于地缘战略的定义，目前国际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界定标准。詹姆斯·罗杰斯（James Rogers）和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认为，“地缘战略是关于在特定地理空间的权力运用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制造影响力的谋划，其目的是保障一国的安全并促进繁荣……”；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阐述了地缘政治、战略、地缘战略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地缘战略是对地缘政治与战略的综合考虑”；雅各布·格里吉尔（Jakub J. Grygiel）则认为，地缘战略描绘的是一国聚焦某一区域进行军事力量投射和直接外交活动的努力。^② 尽管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但不难发现他们对地缘战略的认识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强调特定地理空间的重要性。和地缘政治学一样，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地缘战略的研究似乎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对德国纳粹的恐惧和厌恶致使这段时期的相关研究几乎停滞。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物理空间的过度强调相比，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理论对物理空间的理解比较客观，但在当前以

^① 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页。

^②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strategy>.

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中，地缘位置的价值依然不容忽视，近几年频发的地缘竞争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前文所述，任何地缘战略的构建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然而地缘政治理论长期以来被西方所垄断，充满权力政治色彩，这也是本文强调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需批判性继承西方理论的原因所在。综上所述，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设计既要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也要在自身实力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战略谋划。

第一，清楚确定地缘战略目标。制定地缘战略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地缘战略目标。地缘战略涉及特定的地理空间，因此需要对不同地理空间的重要性进行划分，而这种划分又取决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主要是维护国内的安全与稳定。^① 而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则需要确保中国的领土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避免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保障中国的国际市场进入以及贸易、能源运输的安全，因为这些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对中国整体战略利益的认知基础上，需要对不同的地理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并明确地缘战略重点。

笔者认为，可以对不同的区域进行优先等级划分，具体划分标准主要是对中国领土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程度，可分为地缘战略核心区域、地缘战略重要区域和地缘战略次区域。根据这种划分，中国的战略重心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② 根据与中国领土距离的远近程度不同，尤其是紧邻中国领土的周边区域可以归为地缘战略核心区域，因为其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领土安全构成直接影响；而对于一些远离中国本土，但是对中国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可以归为地缘战略重要区域，如印度洋地区，中国能源进口的80%都要经过该地区，^③ 因此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统计局编发的《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比2000年增长了近3倍，其中2015年中国的原油和天然气消费占能源总消费的比例

^① Akshaya Handa, *China's Geo-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Behavior*,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Private Limited, 2014. p. 100.

^②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 78.

^③ David Brewster, "An Indian Ocean Dilemma: Sino-Indian Rivalry and China's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in th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 11, No. 1, 2015, p. 49.

分别为 18.1% 和 5.9%，除少数年份出现下降外，2009—2015 年中国的原油和天然气消费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能源结构的合理调整、优化，中国的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的进口依赖或将加剧，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对中国至关重要。此外，随着中国与部分南亚国家的港口合作项目建设速度加快，中国扩大了在该地区的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导致中国经济利益不断增长，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主要是维护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

第二，动态评估外部战略环境。任何战略的制定都是博弈的结果，即在动态分析对手战略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最优策略。如上文所述，要将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理论注重过程的特点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注重结构的特点相结合。而具体到地缘战略，就是既要重视对不同地理结构空间的划分，也要重视对外部战略环境的动态评估，即重视过程的发展。

具体而言，动态评估外部战略环境需要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来对主要国家的地缘战略进行评估，在全球层次主要是美国，在区域层次则是各地缘战略区域内主要国家的有关战略，包括对它们的战略目标、战略手段、战略意志等的系统分析。由于一国的战略总是在不断调整 and 变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主要国家形成战略互动，因此必须注重这些国家的战略动态性和过程性，避免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忽略过程的不足。对全球层次和主要区域层次国家地缘战略的评估不仅有利于了解对方的战略，也有利于了解对方的意图，进而增加互信、减少冲突，同时，更关键的是，这还有利于中国自身地缘战略的动态调整。

第三，综合运用战略手段。对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的理解既不应该回避、拒绝，也不能因此又回归到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对单一权力的追求，而是应该借鉴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有益成分，对经济权力、文化权力、规则制定权等加以重视，同时也不能拒绝对军事权力的适度追求。基于这种变化，权力目标的多元化也要求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即应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手段来实现中国的多元化地缘战略目标。

^①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 2016*,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eh.htm>.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不同的战略手段时,经济手段是最为重要的,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国的反应来看,经济手段不仅能够促进繁荣、增强合作意愿,而且能够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对比分析中美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动机时提出,不同于美国的“传教士”参与方式,中国的对外行动主要是迫于能源、资源安全的需要,^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对外战略的经济性。与此同时,中国在运用战略手段时需根据自身实力量力而行,避免过度伸张而导致战略透支。

另外,只有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为中国的地缘战略实施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始终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崛起的关键因素,例如,18—19世纪的英国,其维持霸权的前提条件是在全球拥有广泛的殖民市场和原料供应地。19世纪下半叶,在俾斯麦的带领下德国完成统一,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庞大的陆军系统和一支足以威胁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力量。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也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强调经济实力最终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因此追求经济利益是国家的主要对外目标。^②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来看,由于内部仍然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加之当前国际上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部分发达国家倾向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据世界银行2017年10月1日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经济更新》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为6.7%,但预计2018—2019年将放缓至6.4%左右。^③尽管这份报告对此前在《全球经济展望:脆弱的复苏》报告中的预期进行了调整,分别对中国2017年和2018—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和0.1%,^④但

^①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 2010, Vol. 89, No. 3, p. 24.

^② 郑永年:《道德外衣下的真实国际关系》,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9月6日, http://pit.ifeng.com/a/20160906/49907728_0.shtml。

^③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Economic update, October 2017:Balancing Act*, October 1, 2017,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72621506963423114/pdf/120158-PUB-PUBLIC-Wednesday-10PM-OCT-4-180p-EAPEconomicUpdateOctweb.pdf>.

^④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 Fragile Recovery*, June 2017, p. 1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800/9781464810244.pdf>.

总体而言世界银行预期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将呈下降态势。^① 因此中国在实际实施对外战略时要保持审慎态度。

结 束 语

综合来看,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部分缺陷,丰富了理论内涵,拓展了研究视野。但从本质上看,这些理论依然具有明显的权力特征,只是分别从经济、文化以及话语权等“软”领域进行探讨。由于任何理论最终既要服务于现实政治,又要靠实践来检验,而且这些理论都主要源于西方,因此中国需在研判自身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进而为地缘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从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事件频发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结合当前中国国家战略的发展,重视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收稿日期: 2017-06-25]

[修回日期: 2017-09-30]

[责任编辑: 石晨霞]

^①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 Fragile Recovery*, June 2017, p. 1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800/9781464810244.pdf>.